

中国政治伦理研究

董治良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中国政治伦理研究

董治良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政治伦理研究/董治良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

ISBN 7 - 5367 - 3668 - 1

I. 中... II. 董... III. 政治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B82 - 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762 号

书 名	中国政治伦理研究 ZHONGGUO ZHENGZHILUNLI YANJIU
责任编辑	张福言
责任校对	陈江涛 蒋颖荣
装帧设计	张福言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 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1500
定 价	42.00 元
书 号	ISBN 7 - 5367 - 3668 - 1/D · 343



董治良，云南保山人，云南大学 82 届哲学学士，中央党校 97 届法学研究生。国家一级高级法官。云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发表有法学、经济学、伦理学论文 60 余篇，主编有《禁毒工作手册》、《禁毒》、《柬埔寨王国经济贸易法律指南》、《柬埔寨王国经济贸易法律汇编》等书。

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GDP总量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巨大成果，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真正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提上了重要日程，并且进展快速。“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协调的方针，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治国方略。在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又明确提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张和要求。

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树立“科学发展观”再次展现了党和政府锐意革新的宏大抱负与进取精神。毋庸置疑，“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是基于一种整体论的观点提出的。它统筹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决不是简单的经济战略。但是，与党和政府的高屋建瓴相比，我们有些地区还继续在那种简单的经济至上论的思维怪圈中打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唯一”，“效率优先”变成了“效率单边独进”，这无疑是不得要领的。正是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与历史条件下，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我把政治伦理的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系统

研究。政治伦理的问题在当前是一个理论的热点，也是一个理论的难点。说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的推进，理论上对于政治问题的相关研究就有着强烈的时代实践的需要，因此，它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将是一种必然。说难点，则是因为：一方面，政治伦理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尚且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政治伦理本身也存在着作为一个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即在大谈“价值中立”与“实证研究”的学术氛围下，对政治问题进行相关的伦理化研究的合法性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作出了详尽回答。在这里须指出两点：第一，源自西方学术传统的所谓“价值中立”与“实证研究”有着自身内在的学术背景和问题意识作为依托，把它们简单照搬到中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因为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中，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融合”才是思想与学术的主流。第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政治问题的研究无法把“事实”与“价值”简单剥离开来。在“以德治国”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无法把政治与伦理问题简单区分开来。相反，学科之间的“交互性”研究在当今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

本课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一点不能动摇。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备的巨大的解释力与卓越的理论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当前时代进程的内在要求。

在这一课题中，我注重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精华的吸收。我相信，政治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于政治合法性的诉求。众所周知，政治合法性问题往往不能撇开历史传统而获

得完全的有效性。同时，当前党和政府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也十分注重对中华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批判性吸收。例如我一再谈到的“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等，都容纳与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传统与理论成果。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却往往对我们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给予了过于激烈的判决。这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心的重大伤害，而且单纯就理论本身而言，也失之武断。西方的思想文化固然有优秀卓越的一面，却仍然无法包医百病。这一点对于当今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更何况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国？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相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与研究，需要坦然而从容地借鉴全人类政治思想与实践的经验与成就。因此，我也专辟一章，对西方古代的政治伦理思想做了提纲性的梳理。我希望对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梳理，能够为中国政治伦理的构建提供可资借鉴的理念。

在这一课题中，我反复酝酿，反复思考，从学理上探讨了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涵，探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构架所应该秉承的基本原则、行为规范与制度规范，进而提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政治伦理评价标准，展望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的前景。我深信，在政治伦理的规范与秩序中，社会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人也将得到全面的发展。

是为序。

董治良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伦理	(3)
第二节 伦理政治与政治伦理	(15)
第三节 政治文明与当前伦理困境	(26)
第二章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	(35)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政治伦理	(36)
第二节 汉唐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46)
第三节 宋明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57)
第四节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的评价	(74)
第三章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	(78)
第一节 古希腊政治伦理思想	(78)
第二节 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92)
第三节 中世纪的政治伦理思想	(95)

第四节	罗尔斯的政治伦理思想	(106)
第五节	西方古代政治伦理思想评价	(112)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理论探究	(12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理论溯源	(12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138)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治伦理的论述及其影响	(147)
第五章	政治伦理的基本内涵	(157)
第一节	政治伦理的内容	(157)
第二节	政治伦理的本质	(163)
第六章	政治伦理的原则	(170)
第一节	集体主义原则	(171)
第二节	人民民主原则	(188)
第三节	正义原则	(199)
第四节	民本原则	(211)
第五节	诚信原则	(220)
第六节	公平原则	(233)
第七章	政治伦理的行为规范	(244)
第一节	人生观和良心论	(244)
第二节	义利观	(251)
第三节	权力观	(256)

第四节	政绩观	(260)
第八章	制度伦理	(265)
第一节	制度伦理的涵义	(266)
第二节	制度伦理的内容	(271)
第三节	制度伦理的功能	(283)
第九章	政治伦理的评价标准	(292)
第一节	社会公正标准	(293)
第二节	民主与法治标准	(301)
第三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准	(308)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标准	(315)
第五节	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标准	(320)
第十章	当前中国政治伦理建设	(326)
第一节	公民道德建设	(327)
第二节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332)
第三节	领导干部道德建设	(336)
第四节	政治伦理的制度化建设	(342)
第五节	中国政治伦理的前景展望	(350)
参考书目		(354)
后 记		(357)

第一章 导 论

在我国进行政治伦理研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们国家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产生和表现出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继续用过去的一些老办法来面对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和矛盾。社会是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变化的，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自然也不能一成不变。而我们要改变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就应该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使之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并且能够解释和解决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党中央高屋建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正是我们党目前所肩负的历史性任务。“和谐社会”这一目标或者说这一概念的重心正是在于“和谐”这个理念上。而“和谐”恰恰是一个伦理性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伦理性的诉求。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和谐”不仅仅是一个高悬于实际生活上的理想性目标，而且也是一个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践行的实质性内容。显然，“和谐”因其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践行的实质性内容，同时它作为社会理念又具有历史的内在性与开放性，这就使得我们一方

面可以在实际生活的实践中不停地趋近于它，另一方面却无法完全穷尽这一理念的本质。但正因为“和谐”这一理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它才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纵观我们党在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目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条线索：那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评价经历了政治的标准、经济的标准之后，我们又开始回归到伦理的标准了。这也正与建国后我们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相契合。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巩固和全面地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权，因此在那个时期我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强调价值评价的政治标准，通俗地说就是“政治挂帅”，这也同时是受到国际社会上“冷战”局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同时也因为经济因素易于成为一种简化的、可以用单纯数字来衡量的标准，随之而来的是对各方面的评价大体上由政治标准转换为经济标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的现阶段，我们又开始把工作的重心聚焦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上。与此同时，我们对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的评价标准又发生了一次转换，我们更强调价值评价的伦理性。^①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抛弃了过去各个历史阶段的评价标准，正像我们目前的历史阶段正是由前面的两个历史阶段发展而来的一样，我们当前的评价标准也把前两个历史阶段的评价标准综合进来了，我们正在形成一种

^① 这一伦理的标准近来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比如前总书记江泽民就已经提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尤其是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更能强而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政治—经济—伦理”的综合评价体系。“以人为本”就是这种综合评价体系的一个深厚的基础。在对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强调伦理标准不仅仅是向中国传统的一种回归，而且更是向政治这一人类群体中的大事大业的本源性的意义的回归。政治正是从人群中产生的，而它的最终目的恰恰就是人，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因此，我们目前进行的政治伦理研究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进程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通过各种形式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需要我们——探究并且做出回应。下面我们就政治伦理相关的各个方面展开论述和研究，本章作为导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澄清政治伦理研究的基本轮廓，即它的目的、意义和必要性。

第一节 政治与政治伦理

政治是我们所熟知的社会现象，我们也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这一现象的内在规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我们的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在日益分工明确的专业化体系中往往容易迷失方向，在枝叶繁茂的树梢中我们往往容易忘记深藏在地下的树根。在各种事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很少有时间来反思眼前的种种事务到底是因何而起，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因此也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机械化的忙乱操作当中，逐渐地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观点，对于我们遇到的问题经常性地把它看作是一件在某个时间段必须加以解决的实际事务，从而迷失在各种具体事务当中，逐渐丧失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敏感性，丧失了对于我们所从事的事情的根本意义的敏感性。用现代哲学家

胡塞尔的话说，我们对于身边的问题往往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①

与此相应的是在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内，随着改革开放后对西方现代学术思潮的引进和吸收，一种在政治领域内试图做到“价值中立”的观点正在浮现出来。在保持政治的“价值中立”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来探讨政治领域内的行政效率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可能把政治消解为一种纯粹的公共管理行为。对此，我们往往把这一理论倾向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政治理念上的发展和进步。当然在政治领域内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是有益的，我们理应抱有这种宽广的胸怀。但是我们也必须提高鉴别力，就像我们得了病就必须吃药才能好，但前提必须是药能对症，并不是只要吃药，不管是什么药都能治病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已经看不清楚政治领域内价值中立化产生的背景，所以才会把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东西当作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来看待。^② 如果我们要进行政治伦理的研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在政治领域内以及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价值中立化”产生的背景以及它所产生的结果，否则我们就无法到达我们希望进行研究的领域。因为“价值中立”是在暗中排除了一切在政治领域内进行伦理研究的可能性的。如果不越过这道门槛，我们就不可能在政治伦理这一研究领域登堂入室哪怕半步。尽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深

① 胡塞尔以“自然主义”来标识那些按照日常生活的成见与习惯来理解与解决生活世界中的问题的人。参看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法国的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公共管理的兴起曾说过：现在已经是管理取代了统治。

刻地感受到了进行政治伦理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可是如果我们不从学理上弄清楚相关的问题，我们依然无法在学理上站住脚。这样会造成我们的研究在学理上的先天不足。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价值中立”的观点国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是在一个西方的学术思想系统内才得以产生的。不管是西方的学术思潮也好还是西方的社会现实也好，发展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产生这种观点是有它长期的基础的。在引进和吸收西方的观点时，我们有必要就西方来谈论西方，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种思想还原到西方现实和思想的“语境”中来看待，即联系西方社会现实和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准确的目光用以评定哪一些是我们消化的，哪一些是与我们的现实相抵牾的。这里我们有必要做出一个基本的区分：我们这里所指的西方指的是近现代西方而言，即古代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它的时间范围从中世纪到现今。

我们通常都认为现代的西方社会是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继而经过工业革命后发展到今天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为现代民族国家开路的近现代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在这里人们首次看到了道德与政治的分离，政治变成了只与权力有关的东西^①，“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这种思想在古代罗马社会中产生，但是在中世

^①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学所作出的贡献，不能否认是他使得政治学脱离伦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君主论》作为政治学的“独立宣言”，也导致了政治学本身的一些困境。对此，有识之士不能不察。

纪的欧洲并没有得以实现，而现在世俗社会在要求着他们自己的权利了。道德上的善与恶就让上帝去评判吧，它与现实无关。在现实中关键的是获取权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又和道德无关。这种从中世纪到近现代转换的步骤被后来的人们把握为人从上帝的怀抱中觉醒。与此相应的是后来这种觉醒在各个领域反映和表现出来，或者不如说也只有从此之后世俗世界的各个领域也才首次地独立出来，它们在独立之初面临的问题都是把道德的评价撇开才能彻底的独立。因为只要这些领域还与道德有关，那么就依然有上帝的影响，摆脱不了上帝的控制。我们看到了《蜜蜂的寓言》，那是经济领域获得独立的先声，原来以上帝来衡量的恶在现实中的结果却变成了善事。到了亚当·斯密那里这一点仍然在隐而不显地发挥着影响，“看不见的手”取代了上帝的地位，道德完全被从中排除掉了，“道德的人”变成了“经济的人”。在哲学思想上这些变化转入了更深的层次：人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人是有理性的^①——也就是说理性成为人的本质规定、社会是由各个独立的人结合起来的，正像自然界是由各个独立的物体结合起来的一样。

我们在讨论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时常常说西方的社会科学发展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在经济、政治等学科当中，自然科学成功的榜样直到现在还依然发挥着不间断的影响。在经济学科当中数学化的趋势以及部分的实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政治也就快要被纳入到数学化这样看似唯一的科学性的影响当中去了。这种说法并不是只有我们这样认为，这种说法根

^① 对于主体性及其自我意识的研究，请参看倪梁康：《自知与反思》，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源还是来自于西方。但是它并非完全准确，虽然它看起来貌似一种尽人皆知的常识。这种“常识”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它把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时间差转变成了一种因果相承的承继关系。实际上在物理学领域内的原子论和机械主义与在政治学领域内的个人主义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国家和社会学说在本质上是一体的，是同一种思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看起来具有不同的图像，可是去看它们的视角却是同一个。

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至少在外在的形式上就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近现代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图景中自然界被认为是由物体组成的，而各种不同的物体又是由同种的“原子”——这里我们只就“原子”这一名称的内在涵义而言，而不是指由现代物理学中那些由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各种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些“原子”没有内部的构造和动力——也即它们都是被动的，需要靠外力来改变它们的运动状态，各种不同的物体是由“原子”间的相互作用组合起来的，物体的运动被简化为用时间和空间可以衡量的量化数字，物体的运动规律可以由数学的方程来表示，各种不同的物体通过外在的作用结合成整个自然界，在结合的过程中力量大的物体会形成一个中心。

与此相对应的人类社会的图景是由这样一些假设构成的：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组合起来的，这些个人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是“人是生而平等的”这个论断的依据），个人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或者说欲望，他们结合起来是因为恐